

在反思性斷裂與批判性回歸的辯證路徑 上，探尋新知識的可能： 評述《港都百工圖》

鄭瑋寧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謝國雄的新作《港都百工圖》(2013)是一本意圖深遠、格局恢弘、論理細膩並處處可見知識創新的社會學著作。作者以薪資制度之安排與運作、勞資範疇的分化、關係之打造為軸心，從具體互動（社會學關懷）、在地範疇（人類學的文化概念）與存在感（現象學啟發）等三個層面入手，細緻地勾繪並重新概念化勞動過程，以此探究商品拜物教在台灣社會究竟是以怎樣的面貌與邏輯在運作或是不運作，從而確立台灣在「資本」轉性的歷史過程中所經歷的社會形構之機制、運作邏輯、過程與糾結樣態。就理論意圖而言，作者藉台灣社會的個案研究，與西方勞動和資本主義相關研究文獻，在諸多議題上進行了涉及知識論乃至於存在論層次的切磋琢磨，以個案的特殊性來重新概念化既有知識範疇。立基於此，他進而站在與西方研究成果同等的理論高度，與之進行深度的對話，使西方個案與文獻相對化，建構出一套能夠準確定位過去多方研究論點的理論架構（結構力量與行動的大迴路）。就知識創新而言，除了立基於前述的相對化西方研究成果背後涉及深刻的反思之外，作者將不同學科所長結合在社會學對個人能動與結構力量如何互動這個基本關懷下，不僅確立了存在感乃是自成一格的實在而能成為社會學的基本議題，更進一步將被研究社會整體圖像的勾繪細緻化與立體化。另一方面，作者在田野中經歷的挫折與困局，迫使其重新思考研究者對社會現象的再現形式與建構社會學知識的關係。作者以書稿作為社會學介入的另類形式，並以小說作為革命

性的學術再現形式創造出複調：確立另類的社會實踐形式所具備的知識創新能力(capacity)，同時以新的再現形式開啓反思知識的性質、建構與再現的可能性，進而呈顯社會學研究的清新視野。

以下，我將分別從兩個層面來討論《港都百工圖》並為其定位。第一，我將討論作者從主張整體社會範疇到提出在地理解範疇的轉向，是否有助於掌握並準確定性被研究者的主觀認識層面？第二，我將從作者提出兩種建構實在的本體論立場這個論點出發，重新審視《港都百工圖》觸及到有關實在與虛幻、想像或表象間關係的民族誌，以解析出作者處理該課題時疏於照顧的面向。最終，這些分析與提問將輻輳到一個基本問題：作者在《港都百工圖》中是否提出了台灣社會的整體圖像？

社會人文學科知識的存在論轉向？

若將《港都百工圖》放置在人類學與相關學科在本世紀以來的存在論轉向這個知識脈絡中，我認為這部作品有兩項具體貢獻。其一，本書對高雄勞工存在感的研究，解決了絕大多數採取現象學取徑的人類學研究未能將存在放回個人身處的社會文化脈絡這個困境，更將現象學如何與社會人文學科研究有效結合以解釋現象帶向新的境界。其二，本書清楚指出存在感的性質乃是同時具有普遍性與地方社會的獨特性，清楚向實證科學觀影響下的知識實踐者證明存在感的性質，而不使這類問題流於庸俗的文化相對論，或企圖以「文化」的黑箱來偷渡嚴謹規範下的學術解釋。

謝國雄對存在感的討論的貢獻，在於證成了存在感乃是 Durkheim 意義下的社會事實。首先，勞工對資本主義的經驗所關涉的存在感之內涵，是支撐生存的軸心意義，而這密切關聯到家和工作的實踐，並自前述軸心意義的實踐過程中，辨識出更普遍的存在感（攸關存在的確定感、安全感及人生的方向感，關涉能動的可能和限制、被觸動的情感及情緒，以及回首昨日種種油然而生的歷史感）。其次，存在感的社會起源是勞動生活中的各種行動。藉由辨識出存在感與資本主義

經驗的關係，作者進而指出资本主義／結構力量如何被「存在化」，這不僅能有效解釋何以行動者「不動」，更能精細解析人如何在被存在化的結構力量中找到／創造出能動的空間、甚或使能動被實現。更重要的，作者確立了存在感作為一個社會分析基本議題：存在感源自結構性力量，其性質卻與之相異；存在感不僅是能動與結構力量連屬的表現、是自成一格的實在，更能對行動與結構的連屬產生效應。討論存在感可以細緻化我們對社會結構力量的性質、呈現樣態與效應等層面的多層次理解。

首先，讓我將《港都百工圖》（以下簡稱《港都》）與《茶鄉社會誌》（謝國雄 2003）（以下簡稱《茶鄉》）併置，簡單地勾勒謝國雄從「在地理解範疇」這個分析概念朝向存在感的知識轉向，以及這個轉向所展現的理論意涵與縫隙。

在《茶鄉》一書中，作者對在地理解範疇的討論是藉在地文化慣語(cultural idiom)來建構理解範疇的性質，確立其有經驗的基礎與效度。接著，作者受現象學影響而特別提出「做」這個範疇，將其定性為「存有範疇」，超越理解範疇具有的認知意涵，且能呈現當事人體驗卻無法認識到的層次。「存有範疇」既預設、活化與體現了宇宙觀，兼具物理性理解下的「天地人」及個人的在世存有(being-in-the-world)。到了《港都》一書，「做」與「家」、「命」等一同被劃入在地理解範疇，而《茶鄉》一書中的「做」這個範疇所指涉的在世存有獨立出來成為存在感，至於「做」有關物理性理解下的「天地人」之意涵及宇宙觀，有一部分被納入「命」這個範疇，其餘層面付之闕如。

《茶鄉》一書勾繪出在地理解範疇的深度與複雜性，到《港都》一書在討論在地理解範疇時，似乎被限縮，而此一限縮對於概念化理解範疇與存在感間的關係，造成怎樣的影響？在《茶鄉》一書中，謝國雄清楚指出整體社會範疇體現了社會性原則：務實、對等交換，從而能體現整體圖像；茶鄉各種社會生活領域是分立的，非整合的。所謂的在地理解範疇，同時包含認知範疇與存有範疇，同時是制度與實

踐，且具有可塑性：延續、超越、自成一格、新增、矛盾等。換言之，整體社會範疇關乎被研究對象的社會性原則之展現和顯現，而在地理理解範疇與結構力量、個人實踐之間有相互辯證關係，從而既能引導人的行動、作為其理解世界的依據，而個人與其他層次結構性力量同樣能對其做工並重新建構其性質與內涵。對照之下，以《港都》一書對「家」這個在地理理解範疇的討論為例，作者似乎只展現了該範疇自成一格的邏輯和特性，幾乎不見可塑性。若我們將「家」和「命」這兩個範疇的性質相互對照，「家」範疇的自成一格性質更形強烈。另一方面，「家」作為一在地理理解範疇，性質究竟為何？從《港都》的民族誌來看，「家」這個理解範疇，往往與家相關的制度性安排而成的結構性力量有所關聯，同時，家更滲透到行動的倫理依據和判準，是個人情感的依歸。換言之，家是結合理解範疇、制度、倫理判準與情感的四位一體。正因為作者將「家」範疇所涉及的倫理與情感面向清楚標記出來，存在感的問題才可能浮上檯面。這是《港都》討論在地理理解範疇性質時，既有對 Mauss 理論的受繼，又能確立探究存在感的顯著意義，從而有別於 Durkheim 與 Mauss 的理論意圖。

謝國雄念茲在茲的是在地理理解範疇的自成一格，但是這個理論上的心之所繫，同時蘊含了範疇的不可化約性。事實上，《港都》一書在處理資本轉性的社會歷史過程中，「家」範疇似乎不為所動，有如跨歷史的自在範疇(category in itself)。從民族誌上來看，作者以稍嫌單薄的民族誌來再現「家」範疇的內涵，但對那些薰陶出「家」或其他範疇與相關實踐的日常生活脈絡與紋理，未能提供細緻、深入的材料。事實上，作者的詮釋方式似乎假定讀者能理解、明白漢人的人觀、性別分工與家庭生活的實在，彷彿家的內涵是不證自明的。至少，作者並未如他在證明存在感這個課題一般，向讀者證明「家」範疇或其他在地理理解範疇何以是不可化約、自成一格的。

然而，「家」範疇真的是不可化約的？讓我從(Maussian)理解範疇來回答這個問題。從《茶鄉》與《港都》來看，家是由更根本的人觀、性別與工作等理解範疇所構成的範疇，而「家」範疇作為存在感

的本體，必然是由這些(Maussian)理解範疇彼此結合而成，因為這些理解範疇既是最實踐的、最象徵的、更是結構的。同時，資本主義要求經濟與家庭領域分開與性別分化，與台灣漢人社會的傳統理想相互一致，從而使「家」範疇被強化。不過，只有在人們相信成家是生命歷程必然且唯一的選項時，資本主義與在地的「家」範疇兩者間的無縫接軌，才會被視為理所當然，且使行動者不易對其反思。一旦社會經濟條件使成家變為遙不可及的夢想，或是個人主體性浮現且開始挑戰傳統性別分工的理想時，「家」範疇的內涵勢必受到影響，甚至，立基於此的在世存有之意義，隨之被相對化——這裡不僅只是心另有所繫或另尋出路，而是更基進地對存在感進行存在論上的質疑、挑戰與重構。具體而言，結構力量對「家」範疇的影響，是做工在那些關涉人觀與性別分工的實作之上並使其重構，進而改變其內涵與性質。這甚至會進一步影響到存在感的性質，乃至於受存在感所中介之結構力量的呈現樣態。就此，對「家」範疇之性質的理解及掌握，必然要放回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與個人主體是否浮現的整體脈絡中才有可能。另一方面，我們仍可以追問：在什麼意義下，「家」範疇是不可化約的？從《港都》的民族誌來看，可以區辨出以下兩個層次：相較於前述「家」範疇與歷史及主體性之間辯證的互構，我們看到當勞工在思及工作和生命的意義時，「家」是最先浮上心頭的意象，是一個跨越了具體生活安排、衡量生活一切的倫理判準，到確立個人存在的存有空間的意象，換言之，家同時是物質的、倫理的、情感的、道德的及美學的，而不僅是純粹觀念的或智性的實體(intellectual entity)。我認為，在此意義下，「家」這個範疇才是不可化約的。

再現的危機，或是重新認識表象與實在間的關係？

在這一節中，我將以「寂靜之聲」這一章為評論與提問的起點。其一，作者將幻想小說作為再現社會學知識的一種形式，以挑戰寫實主義的再現形式背後蘊含的知識本體論問題這個立場，可能會使那些層面或問題因而蒙上陰影(overshadow)？其二，存在感這個基本議題

的浮現與證成，是否需要特定再現形式才能顯明(manifest)？

首先，相較於前面各章，「寂靜之聲」以融合小說與戲劇的技法來再現勞工的存在感，的確能觸動個人心緒和感受。作者認為，小說和社會學對於實在的本體之立場涇渭分明：前者仰賴幻想而後者立基於寫實主義。不過，這是研究者從學科訓練的角度來思考再現形式與實在的本體論而得出的論點。在抵達這個結論之前，應該要問：社會學向文學借鏡的理由及理論意義何在？比較而言，人類學向小說或文學借鏡雖非主流卻也行之有年，而人類學家借鏡文學的理由有二：其一，既有的分析概念無法有效掌握研究對象的性質；其二，既有的再現形式無法有效呈現出處理新議題時所需的細膩、複雜的民族誌。讓我舉兩個例子來說明。

第一個例子是 Michael Taussig。Taussig (1987)研究哥倫比亞鄉民如何透過 *yagé* 這種夜間治療儀式來認識、體驗與再現他們的殖民經驗、對西班牙殖民者的意象以及殖民史的意義。在分析過程中，Taussig 認為 Victor Turner 所建構的儀式概念化有個致命傷，即 Turner 假定了儀式具有普遍或擬似普遍的特徵，其終極目的在於追求合一(unity)，且是一種不可分割的合一性。該特性體現在儀式象徵皆強調純潔、原初且毫無縫隙等性質，此一象徵上的純潔意味著完整、不可分割。對比之下，Taussig 認為，*yagé* 夜間治療儀式是破碎的、雜亂蔓延著、寓言式的(allegorical)、無政府優勢的。在儀式過程中，危險、幽默與解放的符號毫無章法地混合在一起，以打破語言常規和符號的意指功能(signifying functions)。因此 Taussig 援引法國劇作家、詩人、演員兼劇場導演 Alain Artaud 提出「無政府劇場」意象，以釐清 *yagé* 儀式的性質。事實上，Artaud 所創立的殘酷劇場，蘊含了滿是衝突的無限視野(an infinite perspective of conflicts)，對 Taussig 而言，該意象更貼近 *yagé* 這類儀式的性質。此外，Taussig 更借道於 Walter Benjamin 的辯證意象(dialectical imagery)，來分析與掌握 *yagé* 儀式中的各種意象，以呈現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對彼此的認識、經驗與歷史的複雜樣貌 (Taussig 1987)。

另一個例子是黃應貴的《「文明」之路》第三卷(2012)。在再現新自由主義秩序下布農人的日常生活形貌時，黃應貴主要藉小說技法來嘗試新的民族誌再現形式。在面對當代社會中如情緒、情感反應乃至於存在等常見卻不易深入的課題時，人類學家反省到既有再現形式的內在侷限，例如，過度著重敘事語言意義的解析，以及有限的田野經驗造成研究者不易掌握人類互動中非語言的、情感的或無以名狀的幽微，甚至意識到人類情感互動的深度與文化觀念的作用，是如何在時間的長河中逐漸醞釀、轉變。因此，受小說技法所影響的再現方式，非有深刻且細膩的民族誌資料不可，有別於一般人類學常用的說故事或擬似報導文學的再現方式。此外，黃應貴在思考當代宗教並試圖對其找出新的提問時，更深受日本小說家大江健三郎《燃燒的綠樹》(2000)的影響，並自閱讀大江的小說中，逐步確立了黃應貴心中認為當代人類學必須面對的關鍵課題：「什麼是人」，以及「什麼是時代精神」。就此，深刻的文學作品啟發人類學的思維以淬煉出新的提問，進而拓展了知識視域、乃至於學科知識的終極關懷。

相較於此，謝國雄展現了更強的企圖心並直搗黃龍地問：幻想能否作為我們再現社會實在的形式？其合法性機制何在？強烈的企圖必然會面對來自讀者與學科知識的嚴苛質疑和挑戰。首先，我們要問：從《港都》一書涉及當地人想像、虛幻相關的民族誌來看，他們如何看待幻想／想像／虛幻與實在間的關係？他們在生活中是否真能清楚區辨幻想與實在之別？其次，港都勞工如何透過非實在的形式來理解與建構實在？由此，我們才能評價：作者在該章採取了結合小說與戲劇的再現形式，能否有效再現當地人對想像與實在間關係的特殊再現？從而能夠面對：在什麼意義下，幻想或想像，能夠成為社會學這門學科知識用以再現社會實在的形式？同時，我們才能辨識出由此所形成的知識之合法性機制。

對體現務實原則的港都勞工而言，幻想或想像，是在個人對現實不滿卻又不願屈從於無能為力之際才會靈光乍現。例如，美麗島工廠的工人將膠布想像為人、或是假想自己是畢卡索而能將工廠餘料轉為

創作所用，而作者認為想像是對現實的生猛批評與創意能動的展現。這是該書對勞工的想像最直接、簡明的說法。此外，另一個未被作者視為想像與虛幻、但就分析上而言性質類似的是宗教／宇宙觀或儀式實踐，例如，皮鞋師傅藉算命來決定該如何選擇工作，以及美麗島工廠工人在中元普渡時祈求生產過程順利。我同意作者在書中的民族誌詮釋，然而，若從行動者以怎樣的非實在形式來認識與再現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可以說：港都勞工對每日的、可見的生活安排，既仰賴具體行動的完成，同時也相信超自然的力量與作用或影響。換言之，勞工的務實關懷之實現，並非將影響人的互動與社會生活的力量囿限於此時、此刻或此世，在平時隱而未顯的宇宙觀秩序與運作邏輯，與此時此世的實作一同運作，才使社會生活得以可能。

更進一步，讓我們從港都勞工的商品拜物教之形成或逆轉，來考察港都勞工對於實在與想像／虛幻間的關係。在《資本論》中，Marx將工資形式或商品形式這個表象是萃取剩餘價值對反形式，而商品拜物教則是對反形式或非實在形式成功掩飾實在的極致表現。換言之，表象是作為實在的對反形式而存在，或者，表象就是行動者用以再現實在的非實在形式。另外，表象無關乎真假，反而是實在得以成立、作用的形式，從而構成了多層次的實在。

在《港都》的結論章，謝國雄透過資本主義生產與交換邏輯如何被看穿，來揭露萃取剩餘價值無法再被掩飾的事實。換言之，純正資本主義勞動過程中的商品拜物教所賴以成立的表象，對港都勞工發揮不了作用，他們看穿這些表象，直視萃取剩餘價值的本質。即使被看穿，為什麼在港都，商品拜物教還是形成了？且運作了？作者認為那是因為結構力量被存在化、被中介，幾乎不再以赤裸原形現身，從而讓萃取剩餘價值這個實在，以見山不是山的樣貌出現，或者，以特定呈現樣態出現並作用。作者認為呈現樣態的性質是：結構力量在行動者眼中看起來的樣子。在我看來，呈現樣態就是行動者打造出來的表象(appearance)，而港都勞工的存在感，展現了類似《資本論》中商品形式這個表象的作用，從而能對結構力量進行諸如 veil, disguise,

transfigure, conceal, separate 等中介作用。被研究者自有對實在的認識與再現，而存在感就是他們以切身經驗與感受來再現結構力量，使其現身、作用。存在感不僅是行動與結構兩端的中介，更是行動者對於結構的切身再現(embodied representation)。就此，《港都》對呈現樣態與中介的區辨和運作邏輯之討論，細緻並深化 Marx 對表象與實在間關係的概念化。

另一方面，作者不斷強調存在感乃是自成一格的實在，那麼，港都勞工又是以那些非實在的形式來再現他們的存在感？例如，前述皮鞋師傅藉算命來決定該如何選擇工作時，可否說是以宗教或非存在的方式來再現存在感？若是，我們要如何定位與定性這些非實在形式？這些形式是否會影響存在感對結構力量的中介，甚至影響了結構力量的呈現樣態？相較於港都勞工看穿了商品拜物教的表象／非實在形式的掩飾作用，他們對於涉及存在感的非實在形式，是否能同樣看穿呢？如果不能，是否意味著港都勞工對於「經濟」與「宗教」這兩個社會生活領域，抱持著截然不同的認識論與本體論？甚至不得不追問，孰以致之？

謝國雄對存在感的討論，是在現象學影響下所浮現的研究課題，並透過民族誌與社會學論證來加以掌握、證明。就此而言，他與 Terry Eagleton (2011)從倫理、美學與道德的視角來解析 Marx 著作中有關於個人作為存有的性質與意義，頗有相似之處。Eagleton 關注的是人性的普遍特質，以及人的存有、自主與自由的達成，必須是在他人的存有、自主與自由一同被實現的條件下，而謝國雄則以具體個案來彰顯人的存在感與整體經濟社會環境的侷限密不可分。此外，謝國雄指出，個人的存在感乃是以家的根源作為其關係性的起源，有別於 Eagleton 只是以普遍性的他、我之別來論證個人存有的性質。除了學科知識有別，前述比較更蘊含了兩者處理存在感或存有這個課題時，各自對社會有不同的想像：在 Eagleton，是個人與集體之區辨和彼此辯證；在謝國雄，是個人、家和家之外的領域所構成的連續體。

最後，我要問的是：《港都》一書討論並解析在地理理解範疇、存

在感與結構力量之間多層次、立體的糾結關係，對於理解台灣社會，是否提出了清新的整體圖像？在《茶鄉》中，謝國雄主張，不同整體社會範疇在不同社會生活領域有不同的呈現，且與理解範疇各有獨特的連結方式，並能體現研究對象的社會性原則（即務實與對等交換）。反觀，在《港都》中，謝國雄對存在感的性質與不同層次的掌握，以精細的視角勾畫出資本主義運作邏輯以及在此範圍內的圖像，證明了（創新的）「全括的商品霸權」（這個分析概念）而形成的「社會」邏輯，呈現了家、國家與資本主義彼此糾結的社會圖像。此外，《港都》一書呈現出個人能動與結構力量之間細緻架構、多層次邏輯所構築的立體構成，但是作者顯然未在此一基礎上，勾繪台灣作為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的整體圖像。若說《茶鄉》將整體社會範疇、社會邏輯和社會圖像等三者緊密扣連並提出社會整體圖像，那麼《港都》一書強調在地理解範疇與存在感，對於重新理解被研究社會的整體圖像，究竟帶出怎樣的新空間？的確，若從作者過往認為社會整體圖像的看法是從制度與主觀認識所共構這一點來看，《港都》一書並未告訴讀者這幅圖像為何。另一方面，書中多處提及港都勞工在勞動過程中觸動了各類（有如 Charles Taylor [2003]所稱之）社會想像(social imaginaries)及其所牽連的價值之間的張力，例如解嚴的民主化社會 vs. 戒嚴般的工廠，平起平坐的關係 vs. 科層僵化的關係，強調工廠同仁間彼此互助、互諒的倫理關係 vs. 異化疏離的工作關係等，說不定可為日後探究台灣社會整體圖像提供另一種可能。

參考文獻

- 大江健三郎(2000)燃燒的綠樹。鄭民欽譯。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
- 謝國雄(2005) 茶鄉社會誌：工資、政府與整體社會範疇。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2013)港都百工圖：商品拜物教的實踐與逆轉。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黃應貴(2012)「文明」之路，第三卷，新自由主義秩序下的地方社會（1999 迄今）。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Eagleton, Terry (2011) *Why Marx Was Right*.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Taussig, Michael (1987) *Shamanism, Colonialism and the Wild Man: A Study in Terror and Heal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aylor, Charles (2003) *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